

中国伦理学 60 年

王小锡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伦理学 60

王小锡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伦理学 60 年/王小锡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8 - 08887 - 0

I. 中... II. 王... III. 伦理学—思想史—中国
IV. B82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768 号

责任编辑 田芳园

封面设计 傅惟本

中国伦理学 60 年

王小锡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504,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8887 - 0/B · 781

定价 48.00 元

中国伦理学 60 年

课题组成员

主持人

王小锡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

成 员

(以姓氏拼音为序)

郭建新 南京审计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姜品花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刘 琳 法学博士、徐州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李玉琴 法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李志祥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陶 涛 清华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王 兵 南京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王 淳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露璐 法学博士、江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王小琴 中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汪 洁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夏明月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许敬媛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余达淮 法学博士、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露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教师、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张 曦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张 霄 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
张 振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在读博士
张志丹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后
周 莉 法学博士、徐州工程兵指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
朱金瑞 法学博士、河南财经学院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

序 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今天,一些棘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正在凸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当然,如果能正确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挑战也是可以转化为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作为伦理学人,在这样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社会伦理道德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上呢?它有多大的价值?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作为研究道德现象的伦理学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吗?能够作一番具有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伦理学学科事业来吗?我以为,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要花费一番工夫的,只有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状况,找出问题,探明原委,继而才能解除疑惑,寻求出路。但尤为重要的是,我们不应陷在过分物化和世俗化的泥潭之中,不应让庸碌芜杂的事务塞满自己的精神空间。我们应在未雨绸缪的角逐和竞争中以自身独有的精神气质和知识素养取道于民,施之于众。我想,这就是摆在 21 世纪的伦理学人面前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为此,对道德的思考和道德理论的研究或许是我们承担这份志业最为重要、且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而在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善于在历经数千年的蔚为壮观的伦理学知识之树上摘取硕果,萃取精华;在变动不居、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中察幽探微,剖因析理,树帜立学,同时,还得做好“对研究之研究”的工作。所谓“对研究之研究”,即研究前人或前面之研究,一来回顾思路历程,强化学术记忆,以承前启后;二来点出问题所在,借鉴前人智识,以开拓创新。我以为,要理解当代中国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新境遇和新问题,至少需要去回味我们在学术上曾经经历过的坎坷和感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辨理论上的是非,反思理论上

的得失,从而找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如今,我们的伦理学研究无论是在原理上、思想史上,还是在道德建设上都已成就卓著。然而,我们对自己六十年来的“研究之研究”,无论是在思想史上、理论问题上,还是在人物探究上都显得相对薄弱。出于此,我们全力以赴、群策群力,共同推出了这部《中国伦理学60年》。

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来的发展,虽历经坎坷,步履艰难,却柳暗花明,日趋繁荣,并正展现出屹立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的“显学”发展态势。六十年来,我国的伦理学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初;二是从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三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在此期间,我国伦理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它面向实践,不断创新学术理论,增强了学科的活力和魅力,彰显了伦理学学科的价值。

1.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初是新中国伦理学的萌芽期。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前三十年伦理学基本被作为“伪科学”而无法进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殿堂,中国伦理学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中。客观上讲,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必然蕴含着伦理道德,它总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无法也不能摆脱生产和生活中伦理道德内容,因此,人们在思考经济和社会问题时,不管人们承认与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涉及伦理道德维度的考量,从而形成了特殊时期的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当时,伦理道德观念主要体现在人们创作的文化产品及其社会观念中。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中,也必然会涉及伦理道德理念。诸如毛泽东同志早在1939年撰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提出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和在1944年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思想等等,曾经作为主流道德观长期影响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至今仍在发挥着道德主旨的作用。这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曾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张扬和发展,只是伦理学尚未作为一门具有正当“名分”的学科而已。

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一个伦理学教研室。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罗国杰、许启贤等撰写了一系列研究伦理学的相关理论文章,这些标志着伦理学研究曾出现过短暂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初这段历史时期,冯友兰、张岱年、周辅成、李奇、周原冰、冯定、罗国杰、许启贤等老一辈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相继发表了许多伦理学方面的理论文章和相关著作。诸如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1958年),周原冰的《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1956年),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1956年),李奇的《道德科学初学集》(1979年)以及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1964

年)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其论题涉及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问题;道德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道德的起源、演变和社会作用;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共产主义道德及其原则;幸福范畴;人生观;道德评价,以及一些中国伦理思想史和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的著述。在有些问题上,还产生过影响很大的争论,比较突出的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和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且尤以后者为最。可见,新中国早期的伦理学研究已触及了不少最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问题。但是,研究多为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而且,由于研究中政治意识相当程度上冲淡了客观、公正而自由的学术探讨,故而讨论的也多是—一些最为基本的大问题,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和教育。但回头来看,尽管这短暂的繁荣如同“昙花一现”,但它却投射出了新中国伦理学史上的第一缕春光,让伦理学人体验和感受到伦理学学科魅力之所在。

2. 从改革开放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新中国伦理学的形成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借着改革开放的春潮,科教事业百废待兴,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工作也逐步开始恢复。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并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伦理学教研室也相继建成。1980年,全国第一次伦理学代表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中国伦理学会随之成立。次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国家教委委托开始举办全国高校伦理学教师培训班。伦理学教师培训班历时两届(1981年和1982年),有学员近八十人,为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培养了第一批重要的学术骨干。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伦理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问世(先是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内部教材)。1984年,中国伦理学会和天津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会刊《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5年改为现刊名《道德与文明》)公开发行。同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我国最早获得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至此,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已初具规模,大致成型,这为伦理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在学术研究方面,这一时期伦理学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般说来,对理论问题的探讨,既有来自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也会受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制约,还会因新领域中的新问题而引发新的理论生长点。这些方面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错综复杂;同时,关注和研究的热点也在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归结起来,这一阶段大致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热点问题:

(1)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有无时代意义?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伦理关系和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历史性的嬗变。当时社会上曾一度出现“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一时间所谓“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金钱至上主

义”的思潮沉渣泛起,喧嚣一时,并对原先我们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对此,伦理学界曾围绕在新形势下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时代价值,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同时,由于“一切向钱看”思潮直接冲击和影响了许多不同的职业领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讨论也与职业道德问题的探讨紧密联系。

(2) 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批判。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是与如何对待传统伦理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讨论的是要不要继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伦理道德以及中国传统道德中哪些可以继承、如何继承的问题。而对全盘西化的批判则是与如何对待西方社会的伦理思想和道德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主要讨论的是应该借鉴和吸收什么样的西方道德文化和伦理思想,应该把借鉴和吸收来的东西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如何为我所用?可以说,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和对全盘西化的批判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其中心问题实质是应该如何对待传统的和西方的道德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和理论体系。

(3)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本质及其道德原则? 一度出现全盘西化思潮只是一种对方式和过程的描述,但全盘西化什么呢? 从伦理学上讲,针对的其实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问题。对于个人主义而言,焦点集中在是以坚持集体主义为价值导向,还是以个人主义为价值本位。对于人道主义而言,当时的理论界有过很大的争论,伦理学界也有所参与。它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人、人性和人的需要问题,在伦理学上就是如何认识人、人性和人的需要在道德生成和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由此,便有了一些和伦理学基本原理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认识集体主义、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如何认识道德的起源和本质,以及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应该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曾引发过一些争论,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对道德本质问题的争议。

(4)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掀起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并由此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命题: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他人)。到了1989年,“潘晓问题”再次引起了全社会对人生观,尤其是青年人人生观的讨论。在这场热烈的争论中,伦理学界也积极介入。实际上,讨论人生观,就是讨论人生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讨论人生价值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强调的是应该坚持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如何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场贯穿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尽管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但却引起了全社会对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疑释惑、激浊扬清的作用,提升了人们的人生境界。

(5) 应用伦理学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已开始登堂入室。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科技伦理、政治伦理、法律伦理、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性与婚姻家庭伦理、军事伦理、经济伦理、管理伦理、教育伦理、宗教伦理、体育伦理等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相继出现并渐渐崭露头角。不过,虽然“应用伦理学”的概念已经出现并展开一些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但当时还未有对应用伦理学“元理论”问题的专门研究,应用伦理学多被理解为一般伦理学的“实践”方面,而对各个分支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总体上看,从理论性质上说,这一阶段的伦理学研究大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但也不是说这些研究就没有不同的立场和派别;从理论构架上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已基本成型,但也不是说就没有需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地方;从研究方向上说,已形成了包括伦理学原理、伦理学史、应用伦理学以及道德建设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研究体系,但也不是说彼此之间就没有隔阂与分歧;从研究水平上说,理论的深度和厚度在某些方面已较为凸显,但也不能说在其他某些方面就没有隔靴搔痒之感。总之,在这一阶段,伦理学在新中国从小到大,已渐渐地趋于成熟,等待着它的,将会是新一轮的繁荣和发展。

3.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是新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期。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了的“改革开放”和新一轮深入的“解放思想”不仅“搞活”了经济,“活跃”了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也“活跃”了伦理学研究。面对着全新的契机和全新的挑战,新中国的伦理学研究开始迈上了它那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新征程。

1993 年,湖南师范大学继中国人民大学之后成为我国第二所具有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自此往后,多家高校获得伦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如今,若把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统计在内,设有伦理学专业博士点的高等学府在全国就已达二十三家。这为推动我国伦理学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培养基础。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成立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之后,北京大学也在 1999 年建成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此后,国内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也相继筹建了类似的学科研究机构。应用伦理学研究一时蔚然成风。2000 年和 2004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的道德文化研究中心先后被确定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自落成以来,这两家重点研究基地为推动我国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2002 年,由中国伦理学会委办、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专业期刊《伦理学研究》创刊,它和《道德与文明》一起同被列为中国伦理学会的会刊。2004 年,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首批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中就列有“经典作家关

于意识形态、先进文化和道德的基本观点研究”的子课题。2008年,《伦理学》教材编写也被列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已正式进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之中。在伦理学的学术交流方面,日渐频繁的国内、国际会议也对我国伦理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国内,除了两年一度的中国伦理学会的年会和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的基地年会之外,与伦理学相关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诸如“应用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等学术会议每年例行召开。此外,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开始和国外联合进行与伦理学专业相关的学历教育、访问交流和项目合作,国际学术会议也年年进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际学术交流年会是自1987年开始的“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和自1993年开始的“中韩伦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前者已达22届,后者也已有17届。总之,这些重要的举措和活动不仅加速了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进程,同时也开启了理论研究上新一轮的繁荣局面。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伦理学研究堪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研究领域之广、学科交叉之密、主题热点之多,真可谓空前未有。概言之,研究主题如下:

(1) 关于伦理学原理的研究。自20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伦理学原理研究中的话语体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同时并存两套话语体系:即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和西方伦理学话语体系。相应的,在理论立场上,也就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西方伦理学之分。尽管有不少学者试图在研究中融合两种话语体系,不过,由于各自的理论前提和出发点不尽相同,所要研究的问题域也各有差异,因此,两套话语体系基本上各行其是,即使有所交融,大多也是貌合神离。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面,体系化、系统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基本上已形成了一套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立场、以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集体主义为首要原则的成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有了前期研究的积淀,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原理研究上的理论厚度和深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比如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的研究更为系统、深刻,在道德本质和集体主义等问题上的阐释更为全面、辩证和精当,等等。同时,对经典作家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对经典作家的文本解读更是蔚然成风。但实事求是地说,当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在理论逻辑的自治性上和成熟度上虽已基本圆满,但对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却少有研究,缺乏有说服力的中层理论和微观理论。这一问题的现实表现往往是,在宏观叙事上头头是道,一碰到具体问题便捉襟见肘。所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更进一步地深入实际,深入生活,研究具体问题,拿出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来。

相比之下,西方伦理学研究有其独到的理路和特点。虽然西方伦理学基本原理并没有一套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对许多具体问题和实际问题仍然有其一定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应当看到,尽管西方伦理学在理论立场和出发点上与我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学理研究仍不失独到之处,许多我们当下碰到的问题,他们已有较长时间的研究积累,许多我们尚未触及的问题,他们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因此,随着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影响,在这样一种知识背景下,借外来之合理的研究成果解决和完善当下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实事求是地说,在伦理学原理方面,有一些研究西方伦理学的学者并不是在“照搬照抄”,而是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中国语境下的西方伦理学”也在逐渐显现。但这并不是说在借鉴西方伦理学研究原理的过程中就没有“照搬照抄”、“生拉硬套”、“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等等,有的所谓研究成果只是“学术忽悠”,有的所谓研究成果是连作者自己都弄不清的“语言垃圾”或“文字游戏”。这也是西方伦理学研究缺乏学术市场的症结所在。

总之,无论是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西方伦理学,从伦理学原理研究的角度上讲,只要能坚持真理,去伪存真,就一定会在新的视野中、新的背景下、新的问题上,探索出中国特有或自有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和知识构架。

(2) 关于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研究一直是伦理学研究中的一大传统。更何况,对于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的伦理文化传统的国度来说,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们如何理解当下自身的问题。所以,就中国伦理学研究而言,如何对待传统伦理或许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传统伦理研究成就斐然:①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关于断代史、通史、专门史的研究均有涉猎。研究不仅涵盖了对传统伦理思想总体特征的把握和对一些主要问题的归结,还涉及了以史为基础的全面性的通论性研究。②在人物思想研究方面,可以说,历史上绝大多数具有伦理思想的人物几乎都被“触碰”过。不过,思想研究的热点多集中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如先秦诸子之孔、孟、老、庄、墨、荀、韩,以及一些重要的汉儒、魏晋玄士、宋明儒士等,且尤以先秦诸子为最。③在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化研究上,既有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解读或“翻读”传统伦理以挖掘资源充作现世之功用的情况,也有从传统伦理出发引申现代之价值而阐发问题的情况。④在比较研究上,有人物思想比较、流派思想比较、历史比较、问题比较等不胜枚举,且以人物思想比较居多,而尤以中外人物思想比较为最。⑤在流派研究上,以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居多,且尤以儒家为最,以新儒家为热。总之,这一阶段的传统伦理研究甚为繁荣,寻求传统伦理的现代意味,找寻现代伦理文化的传统之根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不过,也应该看到,无论是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还是以现代眼光重构伦理传统,如何在把握传统伦理与建设现代伦理

之间寻求平衡和进行平稳过渡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就那句耳熟能详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言,究竟何谓“精华”,又何谓“糟粕”呢?此外,还有这样一个明显的问题值得注意:研究传统伦理,研究者要具备包括考据、训诂等国学功底,若不然,就可能会出现误读和曲解的情况,这样一来,所得出的结论也将难以立足。而这一情况,目前在学界并不在少数。

(3) 关于西方伦理思想的研究。自20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对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渐成风尚、蔚为壮观。国内的西文译著及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断代史、通史、国别史、流派史、专门史等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中不仅有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梳理历史的,也有从伦理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和理论问题出发梳理历史的。在人物思想研究上,主要集中在古希腊时期的重要人物、中世纪时期的重要人物、近代英国和欧陆地区的重要人物以及当代著名哲学伦理学家,且尤以古希腊时期重要人物和当代西方伦理学重要人物居多,前者有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后者有如罗尔斯、麦金太尔、哈贝马斯等。在比较研究上,不仅有人物思想比较、流派思想比较、历史比较、问题比较等,还有方法比较、体系比较、专题比较等,数不胜数。在专题研究上,正义和公正问题、自由问题、德性问题、民主问题、幸福问题、善恶问题等涉及最多,辐射最广。在方法研究上,既有从理论体系的层面讨论元伦理、规范伦理和描述伦理的,也有从流派上讨论契约主义、共同体主义、直觉主义、理性主义、感性经验主义、境遇主义、普适主义、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的。此外,这一阶段还出现大量具有资料汇编性质的名著提要、文献选辑和著作摘编,为西方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质量较高、来源较新的资料信息平台。总之,这一阶段的西方伦理研究无论是从所涉及的领域、方面、层级、维度,还是从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上说,都要大大地超过前期的历史水平。但问题是,尽管新世纪以来,关于西方伦理研究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交流也愈发频繁,但真正能够和国际接轨并在了解国外相关知识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有一定深入研究的学者却寥寥无几。这样一来,大量引进的西方伦理学著述和人物思想及介绍性成果良莠不齐,甚至以“一般著作”充“名著”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西方伦理的研究若要再上台阶,除了要在理论思考上下工夫,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也十分必要。

(4) 关于应用伦理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新中国伦理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应用伦理学支撑着整个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大厦。在这一阶段中,不仅早期就已出现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分支学科“更上层楼”,而且还涌现出不少新的研究方向,如网络伦理、信息伦理、社区伦理、工程伦理、传媒伦理、公共行政伦理、文艺伦理等。除了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问题的深入之外,应用伦理学的“元理

论”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加以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从一般理论到应用领域的专业知识,应用伦理学日趋成熟、日渐成型的过程中已基本上“自成一体”,并引领了伦理学研究中众多的热点问题的探究和大致的走向。从应用伦理学的“元理论”研究上看,尽管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的提法实属多此一举,所谓“元理论”更是不复存在,不过学界大多数人均认同“应用伦理学”的学科合法性和存在“元理论”的合理性。从应用伦理学各专业领域的发展状况来看,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环境伦理、科技伦理、政治伦理是应用伦理学这一“显学”中的“显学”。有许多应用伦理学科目甚至已“自成体系”。以经济伦理学为例,在研究层面上涉及宏观的经济制度伦理、中观的企业管理伦理以及微观的企业家道德和员工道德;在研究环节上涉及生产伦理、交换伦理、分配伦理、消费伦理;从交叉研究上看,循环经济伦理研究涉及环境伦理和生态伦理,网络经济伦理研究涉及网络伦理和信息伦理,科技管理伦理研究涉及科技伦理等等。此外,经济伦理学还涵盖劳动伦理、产权伦理、信用伦理、金融伦理、会计伦理、审计伦理、财税伦理、广告伦理等研究领域。可以说,自九十年代初以来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已然成为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史上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是当代伦理学中最为新颖、最为前沿、最富生命力的研究领域。不过,问题还是存在,主要有二:其一,在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中,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多还停留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说明问题、解释问题的基础上,就解决问题而言,应用伦理学的“应用度”显然还不够;其二,尽管各应用伦理学科目之间都具有相互交叉的知识特性和研究倾向,但实际上,“隔离”、“绝缘”的现象还大量存在。

综观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学科建设成就空前未有,学科意义和应用价值日益凸显,学科境界日益提升,伦理学已然成为时代的“学科宠儿”。然而,学术研究中带统摄性的问题尤其是学术研究理路和方法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

(1) 有的学者研究传统仅仅满足于资料的重新堆积和重组,研究西方只满足于照搬、照抄、照传。实际上,这是拿中外学术资源来做学术“忽悠”,是低层次的资料搬弄。事实上,如果研究中国传统伦理不去积极发掘其当代意义,其必然的偏向是在古人的思想或思维窠臼里玩文字游戏。同样,如果研究西方伦理思想,而不作深度的批判性研究,其结果只能是自我陶醉和孤芳自赏,难以解决实质性的理论问题,更不可能将研究指向现实的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实际上,研究西方伦理热衷于抽象空洞的理论假设、醉心于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学术卖弄,终将只能制造学术“繁荣”的外观,与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相距甚远。

(2) 人为割裂形而上研究与形而下研究之关联,制造不必要的研究“壁垒”,以致缺乏创新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真正的学术不仅需要宽广的学术视野,更需要形而上

与形而下、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对于以实践理性为特质的伦理学来说尤为重要。离开了应用或没有应用价值、缺乏对当今社会现实之观照的所谓“形而上”的理论研究,或者缺乏理论透视和理论支撑的所谓“形而下”的应用研究,皆与学术研究的本真精神相悖。正如萨特所言:“理论和实践分离的结果,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把理论变成一种纯粹的、固定不变的知识。”历史证明,真正的学术创新永远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自觉结合的产物。以形而下为支撑的形而上研究,其理论境界将会更加高远;以形而上为指导的形而下研究,其应用的普适性将会进一步加强。当然,就个人能力和兴趣而言,学者可能存在偏重于某方面研究的情况,但至少在思想上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正是由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理论与实践的割裂,导致了从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伦理学界真正具有创新价值的时标性作品和思想观点并不多见,给人们留下历史记忆和学术(思想)记忆的学术观点还十分稀缺。从一定意义上说,伦理学在一定程度上才会对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金融海啸等许多的热点社会现实问题,或是语焉不详,或是言之甚少,甚或处于“失语”状态,这是伦理学发展中形而上与形而下、理论与实践相割裂所形成的一块“短板”,也是今后中国伦理学争取学科话语权必须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中国伦理学六十年来的研究历史所作的回顾与展望,意在起到抛砖引玉之用,希望引起更多的人不单是关注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要关注对中国伦理学研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中国伦理学在新世纪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学界同仁的学术境界不断提升,未来的中国伦理学就一定会沿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前进,从而成为真正的哲学伦理学。这样的中国伦理学会在关注现实中汲取营养、在服务现实中展示价值,并逐渐显于国内、走向世界。这也是广大伦理学同仁之共同愿景。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伦理学学科体系	1
第二章 伦理学研究方法	17
第三章 道德本质	34
第四章 道德功能	51
第五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64
第六章 应用伦理学	76
第七章 经济伦理	92
第八章 企业伦理	110
第九章 劳动伦理	127
第十章 环境伦理	144
第十一章 体育伦理	159
第十二章 政治伦理	175
第十三章 科技伦理	188
第十四章 教育伦理	204

第十五章	法律伦理	219
第十六章	生命伦理	235
第十七章	宗教伦理	249
第十八章	性和婚姻家庭伦理	264
第十九章	传媒伦理	280
第二十章	网络伦理	300
第二十一章	军事伦理	315
第二十二章	管理伦理	331
第二十三章	艺术伦理	343
第二十四章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353
第二十五章	西方伦理思想	364
第二十六章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	382
主要参考书目		403
后 记		414

第一章 伦理学学科体系

新中国已经在历史的航程中整整走过了六十年。新中国伦理学也走过了变革、飞跃、曲折和发展进步的六十年。回溯这六十年中国伦理学曲折发展的历史,就理论体系而言,它首先延续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文化反思对儒家伦理体系的颠覆,它面临的突出而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重建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和伦理原则。因此,总结回顾六十年中国伦理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发展与嬗变的心路历程及其主要成就和问题,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

一、六十年来新中国伦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

在中国思想史上,伦理学的研究总是和其他学科融合在一起的,直到清末仍未能建立起伦理学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我国的伦理学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严格地说是20世纪才开始起步的。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明的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真正产生了系统化和学科化的伦理科学。1906年刘师培编著的《伦理教科书》标志着独立性、系统化的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形成。1909年,蔡元培翻译包尔生的《伦理学体系》,并以《伦理学原理》为名出版,这种集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为一身的实践道德哲学体系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新文化运动及其后期爆发的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以及问题与主义论战,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伦理思想、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三大思潮同生并进,其相互斗争、相互激荡的结果是: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潮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共产主义道德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世纪五十年代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在伦理价值观上的支配和统治地位。与此相应,我们初步建立起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理论体系。